

由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向自主创新发展的突围^{*}

——着眼于深圳、浦东对雄安新区建设启示的历史考察

郑有贵

内容提要: 产业由低端向中高端迈进,是中国提升在国际上的产业竞争力、在价值链上能够充分分享发展成果、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是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标志之一。深圳、浦东在先行先试进程中,由国内短缺经济时期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到国内买方市场形成、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而竞争激烈,再向自主创新发展的转型,实际上是对跨国资本及与之融合的高科技垄断的突围。这一历史进程积累的经验有,新区建设不能止步于政策优惠对企业和产业的聚集,而是应致力于在市场竞争下增强自主创新发展能力;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引入外资,促进公有制经济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创新发展;尊重产业发展规律,既要有全球视野的向产业高端迈进的创新发展布局,还要着眼于区内外产业的协调发展;既要形成通过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聚集人才,还要形成能够保障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这些可供正在进行的雄安新区建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借鉴。

关键词: 深圳 浦东新区 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自主创新 产业升级

由于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试验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探路的国家战略定位,以及试验的成功,学界对于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的研究一直是热点,国际上也把深圳、浦东作为观察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就经济史视角而言,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实施的不同于当时全国的经济政策演变,以及由单项到综合、由特许到可复制制度的改革探索历程及其分析;^①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改革开放试验的历史地位,如对于促进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和扩大对外开放,并更好参与、推进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制度性成果;^②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历程。^③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设立雄安新区的决定,并将建设雄安新区定位为继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之后的事关国家千年大计的另一重大战略,这给经济史的研

[作者简介] 郑有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9。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研究”(批准号:2015MZD009)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梁文森《深圳十年总结和未来战略》,《特区实践与理论》1990年第4期;钟坚《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与经验启示》,《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胡谋、田俊荣《开路先锋再出发——写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三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2010年8月24日,第1、5版;《在更高起点上实现快速发展——写在浦东开发开放二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2010年4月18日,第3版;谢国平《浦东故事:这样的梦想更中国》,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版;赵启正、邵煜栋《浦东奇迹》,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7年版。

② 陈必生《我国特区经济性质问题的几种不同观点——〈经济特区问题探索〉一书评介》,《学术评论》1982年第6期;王爱珠《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看深圳特区经济的性质和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4期;梁文森《深圳特区所有制结构问题》,《经济学家》1990年第4期;谢国平《财富增长的试验:浦东样本(1990—201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张维为《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上海:世纪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英]马丁·雅克著,孙豫宁、张莉译《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③ 梁文森《论深圳特区经济由“速度型”向“效益型”的转变》,《经济科学》1991年第2期;袁易明、姬超《资源约束下的经济增长转型路径——以深圳经济特区为例》,《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10期。“Shenzhen is a Hothouse of Innovation”, *Economist*, April 8 2017.

究提出了雄安新区建设可以从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改革开放试验中得到什么启示的新课题。基于这样的研究视角发现,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在改革开放试验中突破强势的跨国资本及与之融合的高科技垄断,由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是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向自主创新发展转变,这种由引进模仿向自主创新甚至在一些领域引领的突围,可供把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相对较弱的雄安新区打造成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和自主创新发展高地借鉴。

一、深圳、浦东由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向自主创新发展突围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起至改革开放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科技和产业水平,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其间,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是农产品及其初级加工品,以此换取外汇,用以购买国外先进生产设备,例如1973年开始实施向美国、联邦德国等发达国家引进价值达43亿美元的成套技术设备的计划(简称“四三方案”)。这样的对外商品贸易结构,反映出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产业和技术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以及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所处的低端层次。

无论是于1980年起步的建设深圳经济特区,还是10年后1990年启动的开发开放浦东新区,就产业而言,都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两者的差别是,深圳经济特区建设起步时,主要是开展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简称“三来一补”);浦东新区开发开放起步时,是在经济全球化加快的情况下,由于发达国家加大其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速度,加之在改革开放10余年后国内产业发展能力已有提升,因而起步相对较高,并演进为水平更高、相对完整的产业承接。这种对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与美国、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针对经济滞胀实施供给学派政策走出困境相遇,使得全球产业竞争更为激烈。中央基于这样一种国际竞争及长远发展需要,明确了深圳、浦东在创新发展中的战略定位。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要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浦东新区,鼓励其在扩大开放、体制创新、产业升级等方面继续走在前面,发挥对全国的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鼓励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在扩大开放和制度创新等方面走在前列。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更好发挥经济特区、浦东新区、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在实践中,深圳、浦东在发展中积蓄和提升创新发展能力,成为全国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高地,创造了在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史上都可称得上奇迹。

(一) 深圳经济特区基于“三来一补”形成自主创新产业体系的演进

1979年4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赞同习仲勋等提出的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等地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意见,并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① 这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共广东、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要求广东、福建抓住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出口特区”被正式命名为“经济特区”,提出把深圳建成兼营工业、商业、农牧业、住宅、旅游等事业的综合性经济特区。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经济特区,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一立法程序的完成标志着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作为第一批经济特区之一的深圳,由于比邻香港、澳门,可以经香港、澳门融入国际经济发展体系,因而一开始就被定位为对外开放的窗口、桥梁。敢于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国际、港澳台及华侨资本,之所以选择到深圳落户发展,是因为其在美国、英国等经济滞胀的情况下,过剩资本在全球范围寻找新的投资机会,特别看好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处于短缺经济时期所具有的极大潜在市场。在这样一种国内外因素的历史性相遇下,深圳成为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试验地,也成为国际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10页。

资本进入中国的试水池。在中国与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深圳经济特区通过允许办实业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简称“三资”企业),把引入外国资本、先进技术(尽管主要是“三来一补”,但其技术在大陆是高水准的)、管理经验结合起来,加之给予“三资”企业在土地使用、税收等比国内企业优惠的政策,以及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较低的成本优势,由此所形成的深圳速度、深圳效益,给全国带来极大震动,对全国改革开放发挥了示范和引领效应。然而,在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初期,国外资本从保持竞争优势出发,在入驻时没有输入最核心的先进技术,而是以“三来一补”的较低层次的外向型加工为主。

深圳经济特区基于改革激发的活力和动力,逐步提升自主创新发展的内生能力,从起步时的被动的以“三来一补”为主的产业分工中突围,成为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城市之一。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的低层次的加工贸易型企业,在全球,即便是在国内的竞争中,其发展也难以持续。深圳面对市场优胜劣汰的强大压力,没有满足于成为依赖从事出口的“外贸通”,而是选择了创新发展之路,逐步形成以基础研究为引领、产业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开放合作、民办公助的创新体系,突破了被动的“三来一补”产业分工,走出了“血汗工厂”的发展阶段,成长出了华为、中兴、比亚迪、腾讯等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自主创新企业,也涌现出大批成长性强的中小科技型企业,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互为支撑的自主创新产业体系。福布斯对2014年中国大陆城市创新力的评选结果显示,深圳位居中国大陆城市创新力排行榜之首。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66.2件,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6倍。2016年,深圳国际专利申请量超过1.8万件,连续13年位居内地各大中城市之首。2016年新增认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523家,累计8037家。在境内外交易所上市企业有346家,中小板、创业板上市企业数连续9年居国内之首。^①2014年5月,深圳获批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发展增强了国际竞争力,深圳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出口额自1983年起连年位居全国城市第一。2016年4月8日出版的《经济学家》(英)发表了题为《深圳已成为创新温室》的特别报道,称深圳已成为世界创新和发明的“皇冠上的明珠”,给深圳加冠了比硅谷还传神的美名——“硅洲”(Silicon Delta)。1980年至2016年期间,深圳的GDP年均增长22%。^②

(二) 浦东新区基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向自主创新基地和重装备建设基地的演进

开发开放浦东新区启动之时,与建设深圳经济特区启动时相比,国内外经济发展条件和环境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就国内而言,在经济快速增长后,短缺经济问题明显缓解,并开始向供需平衡过渡。就国际而言,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走出经济滞胀困境,经济增长再次步入快车道。高新技术的发展和跨国资本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以及其国内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使得发达国家制造业等向外转移步伐加快,这给中国通过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升级提供了机遇。徐匡迪如此表述过浦东开发的思路:核心是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依托长江三角洲的地缘优势和人才资源,主动承接发达国家产业梯度转移,并根据上海的条件,把承接产业的水平定位在中高端,把浦东新区建设成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交汇点、聚合区。^③

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承载着扩大开放而不断提高外向型经济层次^④的国家战略,逐步融合推进开放和创新,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发展,从起步时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产业分工中突围,成功地转向建设自主创新基地、重装备基地的创新发展。与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启动时有所不同,浦东新区开发开放在启动之前有一个较长时间的谋划过程。1984年12月,上海市政府、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上报的《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提出了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的设想。1986年4月,

① 参见闻坤《新兴产业成深圳经济发展主引擎》,《深圳特区报》2017年4月4日,第1版。

② “Shenzhen is a Hothouse of Innovation”, *Economist*, April 8, 2017.

③ 参见谢国平《财富增长的试验:浦东样本(1990—2010)》,第99页。

④ 参见《在更高起点上实现快速发展——写在浦东开发开放二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2010年4月18日,第3版。

上海市政府在向中央报送的《上海市城市规划方案汇报的提纲》中提出了开发浦东的初步方案。1986年10月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明确提出,有计划地把浦东地区建设和改造成为现代化新区。1987年,开发浦东咨询小组成立并开展了可行性研究。1988年5月,上海举行浦东开发国际研讨会,有140多名中外专家参会并献计献策。这次会议针对近30年上海“削弱了经济贸易中心的功能和对外对内枢纽的功能”,^①提出结合老城区的改造,建设一个现代化新区的方针。在形成浦东开发开放的基本构想后,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于1990年2月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经过较长时间的谋划,浦东新区形成了产业发展空间布局图,这有利于在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时形成产业的合理布局,也为之后向自主创新发展转变奠定了基础。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浦东新区实现了快速增长。浦东金桥出口加工区在承接20世纪90年代国际先进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集聚了通用、索尼、拜耳、松下、夏普、东芝、西门子等世界制造业巨头,1990年至2009年经济年均增长43%。张江高科技园区在承接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国际先进科技转移中,建设自主创新基地,快速推进生物医药、集成电路、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发展,过去由发达国家控制的核心技术工艺、核心元器件、核心集成系统和核心装备,开始被这里的发明创造所替代。临港产业区建设重装备基地,快速形成装备产业、物流产业两轮联动的产业发展格局。新世纪初浦东新区开始转型发展,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又驱动了向自主创新发展转型步伐的加快。2013年启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进一步促进了开放与创新的融合。到2016年,浦东新区高新技术企业达1510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43.6件;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占28.2%;“三大三新”产业^②产值占新区工业总产值的63.2%,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产值分别占全上海市的41.1%和44.9%;中国商飞C919大型客机总装下线,^③2017年5月5日试飞成功。浦东新区地区生产总值由开发开放启动之时1990年的仅60亿元,^④增加到2016年的8731.84亿元,人均产值突破2万美元。^⑤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高级客座研究员这样描绘浦东新区:一幢幢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展示了极为现代的城市风光,象征着一种雄心壮志和一个没有极限的世界。^⑥

建设深圳经济特区和开发开放浦东新区的改革开放试验,所实现的由起步时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向自主创新发展的成功突围,并成为自主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高地,对全国其他地区的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发挥了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提升了中国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为中国到2010年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了贡献。

二、深圳、浦东发展经验对雄安新区建设的启示

深圳、浦东由国内短缺经济时期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到国内买方市场形成、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而竞争激烈压力下向自主创新发展的转型,实际上是对跨国资本及与其融合的高科技垄断的突围,是一种内生能力不断提升的结果。

1. 新区建设在所开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下,没有止步于政策优惠对企业和产业的聚集,而是致力于在市场竞争下增强自主创新发展能力。

无论是深圳经济特区,还是浦东新区,中央从实现其所承担的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探路的

① 《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② “三大三新”产业是浦东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称,“三大”产业是指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和成套设备制造业,“三新”产业包括生物医药、航天航空与新能源产业。

③ 参见杭迎伟《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1月9日在浦东新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http://www.pdrc.gov.cn/pd/InfoDetail/?InfoID=7c7f953f-bbc7-45e0-acee-cba03b16ee7b&CategoryNum=001034028。

④ 参见谢国平《浦东故事:这样的梦想更中国》,第44页。

⑤ 参见杭迎伟《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1月9日在浦东新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⑥ 参见马丁·雅克《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中译本),第83页。

国家战略目标出发,在启动初期都实施了特殊的以放活、轻赋税为主的政策和企业便捷入驻、管理的体制。就浦东新区而言,199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浦东新区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在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由于对外资企业,也包括合资企业,实施相应的优惠政策,两地也都成为了资本实力雄厚、技术先进、管理科学的外资企业的聚集地。

深圳、浦东所开启的逐步深化市场配置资源的改革试验,促进了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成为自主创新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深圳、浦东建设启动之际,中国还是计划经济。深圳、浦东的改革开放试验,实际上也是摆脱计划经济思维约束的探索。这不仅有利于外资企业的入驻,对区内企业和区外入驻的国内企业也提供了新的制度和发展环境。国内企业向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入驻,一开始就是市场行为。对于国内企业,无论是当地的公有制企业,还是区外入驻的公有制企业,都主动改变计划经济下形成的等靠要思维和行为方式,致力于在竞争中向市场要效益、谋发展。深圳、浦东除聚集入驻企业外,由于就业政策的放开和外地人不受歧视,特别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其提供了较高的发展平台,也有极强的人才聚集力,由此也形成了人才高地。

深圳、浦东实行市场配置资源及对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给企业注入了创新发展的动力,成为基于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高地。深圳、浦东区内的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对手,主要是由国际先进技术支撑和雄厚资本支撑的企业,不进则退,进得慢也是退,这种机制逼迫企业必须成为创新主体,才能跻身于创新发展前沿,才能改变处于产业低端在交易中不得不接受“不平等交换”的困境,才可以追逐先进技术所带来的高额利润,进而实现持续发展。实际上,中央在深圳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所实施的放活和优惠政策,目的不仅是引入企业、引进外资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增强内生发展能力。邓小平所说的“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不仅是指通过改革开放试验对固化了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理论误区进行突围,也是指其探索出了在市场竞争机制下求生存发展之路、创新发展之路。面对与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较大差距,中国通过引入外资并在国内办企业等方式引进技术,这实际上也是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路径。然而,仅仅是单纯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其发展不仅受制于人,而且发展空间极为有限。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的改革开放试验不辱使命,自启动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起,在引进中消化,从中积蓄和提升创新能力,逐步探索出了由引进技术到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深圳、浦东区内的企业,与内地企业舍不得在科技研发上进行高强度投入形成鲜明的对比,如2016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800亿元,为GDP的4.1%,^①比内地平均水平高1倍。深圳企业勇于担当创新主体之责,先启动市场终端环节创新,再逐步向上游产业链递进,这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逆向创新,突破了本地没有可以依托的知名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缺乏高层次的科技尖端人才的束缚。在深圳,创新型企业中有90%为本土企业,研发人员有90%在企业,科研投入有90%来源于企业,研发机构有90%建在企业,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有90%以上来源于龙头企业。^②

2. 新区建设在所开启的促进多种所有制企业发展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下,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引入国际资本,促进公有制经济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创新发展。

深圳、浦东按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不仅发展“三资”企业,还探索新的企业制度改革,不仅激发了企业的活力,也逼迫企业不断增强内生发展能力,也就形成了相对区外企业的先发优势,使其在中国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过程中,能够承受住国内外激烈竞争的压力,并在竞争中实现高速发展。这与区外企业在中国转向买方市场后陷入困境形成明显对比。

^① 参见闻坤《新兴产业成深圳经济发展主引擎》,《深圳特区报》2017年4月4日,第1版。

^② 参见《创新造就奇迹 市场催生潜力——解读深圳六个“90”背后的发展动力》,http://news.xinhuanet.com/2010-08/25/c_12484116.htm。

需要特别注意的现象是,在深圳、浦东建设过程中,公有制经济并没有受到冲击,而是与其他所有制经济一道,实现了共同发展。深圳、浦东建设,尤其是深圳经济特区的起步,是在全国还几乎是清一色的公有制经济下,开始了在限定地域引进外资和允许国外企业入驻的试验。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是在分歧中启动、在争论中成长,其中最受关注的问题是深圳的公有制经济能否发展及其所处的地位,并以此判断这里的改革姓“社”还是姓“资”。深圳、浦东都形成了公有制企业与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创新发展的格局,这主要是缘于能够从实际出发并形成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改革发展路径。其中,最先启动的深圳经济特区试验,在发展公有制经济上所遇到的问题最为突出,因而下面重点对其加以考察。

第一,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推进改革开放。深圳经济特区引入外资,不仅改变了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也开启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创新发展的探索。即便是在特定区域内对国外企业实行开放政策,也主要在于引入资本、技术、管理,激活企业,而经济社会的管理没有被强势的跨国资本所控制。

第二,自深圳经济特区起步之日起,公有制经济改革也随之启动。在启动深圳经济特区建设之时,国外资本对进入中国缺乏稳定预期,信心还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国外资本虽然想尽快进入中国发展,但为了避免有可能发生的政策变动风险,一开始还是抱以试探心态,以合作、合资等方式入驻深圳经济特区的较多。深圳经济特区对外资的开放,也促进了区内公有制企业的改革,不仅涉及政府放权使企业获得经营自主权,还涉及企业治理、用工、收益分配等方面的改革,使公有制企业较早地成为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

第三,深圳、浦东的快速发展,形成了聚集效应,不仅聚集外资企业,也聚集区外的国内企业。内地的国有企业,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实施三线建设项目时,在偏远山区兴办的企业,由于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建设滞后等,寻求搬迁发展机会。例如,三线建设中在贵州兴办的电子基地(简称083基地,现为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入驻深圳办了多个企业,实现了新的发展。内地的国有企业向区内入驻,除了区内实行的政策和制度具有吸引力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吸引力:一是通过向深圳、浦东等入驻,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时,地缘由劣势变为优势,降低了产品由内陆地区向沿海港口运输的成本。二是在市场机制下,区内发育成长起成龙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为入驻企业解决了生产经营所需的服务问题。例如,2016年浦东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74.9%。^①三是在区内新办的公有制企业,没有历史上留下来的办社会、退休职工较多等沉重负担,其起步与非公有制企业处于同一起跑线。

深圳、浦东改革开放试验的成功表明,即便是为了引进资本与发展集先进技术于一体的企业和产业,也不能抽象地论所有制结构改革,更不能为引入资本尤其是跨国资本而牺牲当地企业,甚至把国有企业低价私有化,而是应从实际出发,让多种所有制企业都能够公平地实现创新发展。深圳、浦东改革开放试验也表明,国有企业是可以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实现创新发展、成长为竞争力强的市场主体的。

3. 新区建设在开启的打造国内高端产业集群目标下,尊重产业发展规律,既要有全球视野的向产业高端迈进的创新发展布局,还要着眼于区内外产业的协调发展。

产业转型升级有自身的规律。深圳、浦东之所以能够实现由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向自主创新发展的突围,一个重要原因是遵循了产业发展规律。

第一,无论是深圳,还是浦东,都注重发展高端产业,打造高端产业集群。即便两地在初期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时,也是在区内打造国内的高端产业群。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初期,正是中国高档消费

^① 参见杭迎伟《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1月9日在浦东新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由原来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简称三转一响)向彩色电视、冰箱、洗衣机、彩色照相机等家电产品转换升级时期。浦东新区开发开放启动时,外商投资的产业也开始有所变化,由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汽车、电子等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产业扩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深圳重点发展计算机软件产业、通信产业、微电子及基础元器件产业、视听产业、机电一体化产业、重点轻工产业和能源产业等主导行业,制药、医疗器械、生物技术、新材料等新兴行业快速发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成为深圳第一大工业行业。

第二,在资源配置上,向高端产业倾斜。比如,在有限的空间内,规划出专门的高新产业区,把极为有限而宝贵的空间留给高端产业。浦东新区专门规划了张江高科技园区。深圳起步时没有来得及对产业布局进行细化规划,但在之后的厂房改造、产业置换、人口优化等方面向高端产业倾斜,以此促进产业向高端迈进和城市的创新发展。^①

第三,促进区域产业协调发展。开发开放浦东新区一开始就不只是浦东的问题,它是关系全上海市发展的问题,更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的问题。^②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以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为突破口,浦东新区率先全面推开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实现人才自由流动,国内首个保税区、首批中外合资外贸公司、首批国内跨地区的外贸子公司到此落户。这些都使浦东新区具有极强的聚集力。《浦东新区年鉴(1995)》这样记载了浦东新区1994年的对外经济活动:平均每天有2.8个新批外商投资项目,每天引进的外商合同金额为710万美元,每天的外贸商品出口总值为493万美元;平均不到4天就有1个5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签约进区,累计有44家国际知名跨国企业(包括美国的杜邦、兆华斯坦、福特、吉列,德国的西门子、巴斯夫,日本的日立、松下、夏普、胜利、丸红、森建筑,比利时的贝尔,韩国的浦项等)落户。^③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浦东新区为全国首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旨在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探索可复制的制度性成果,又一次促进了浦东新区的聚集发展。至2016年末,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共有企业79669户,其中内资企业62365户,涉及注册资本41403.62亿元;外资企业17304户,涉及注册资本2436.86亿美元。^④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促进了区域带动战略向纵深发展,既促进长江三角洲产业的发展,又使其能够更好地基于长江三角洲的产业发展打造高端产业集群。2010年7月,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珠江三角洲产业布局一体化规划(2009—2020年)》,旨在加强珠江三角洲产业横向错位融合、纵向分工协作,促进深圳与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市,尤其是与东莞、惠州等地在产业布局的一体化。2011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提出各市和省直部门明确一至两个转型升级突破点的要求。之后,于这年3月,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制定了《珠江三角洲手机产业一体化实施方案》,以促进珠三角手机产业的一体化发展。在如此产业布局下,珠江三角洲由以“三来一补”为主起步,发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成为先进的制造业集群。

4. 新区建设在所开启的市场配置资源发展模式下,既要形成通过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聚集人才的机制,还要形成能够保障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

深圳、浦东改革开放试验表明,特殊的政策优惠、便捷管理等可以在新区建设启动之际形成聚集

^① 参见《深圳构筑高端产业集群——建设自主创新城区》,http://www.miit.gov.cn/newweb/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27/n3057531/c3524832/content.html。

^② 参见《在更高起点上实现快速发展——写在浦东开发开放二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2010年4月18日,第3版。

^③ 参见《浦东新区年鉴》编辑委员会编《浦东新区年鉴(199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5页。

^④ 参见《上海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tjcn.org/tjgb/09sh/34835_4.html。

效应,而要实现持续发展,特别是形成自主创新发展高地,更需要形成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机制和能够实现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

一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形成聚集人力与高端人才的机制。一个新区的建立和成长,这里不仅要聚集到企业,还要聚集到人,尤其是高端人才,这取决于能否以人为本,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启动及之后的成长期,正是中国人口红利释放的时期,由渔村发展为大都市,人是其主要增长源,这里不仅聚集了全国的农民工,更是聚集了创新发展所需的各类优秀人才。珠江三角洲在发展过程中,在聚集农民工方面存在一些隐忧,那就是因户籍及与之挂钩的福利政策,使农民工的生活并没有真正融入到当地,因此在区域发展不均的问题有所缓解的时候,则在一段时期内由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演变成为较为严重的民工荒。浦东新区一开始就注重社会发展,成为浦东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浦东新区开发开放前,浦东与浦西在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上有较大差距,也就有了“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民谚。浦东新区开发开放启动之时,由于经济社会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具备了改变“先生产后生活”“先经济后社会”发展思路的条件,不仅重视产业的发展,还形成了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由此,几乎是在一片农田上崛起的浦东新区,获得了联合国改善人居环境最佳范例奖、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以及国家园林城区、全国文明城区等称号。深圳、浦东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基础上的高端产业的成长发展,吸引了大量的高端人才。

二是提供公平的创新发展环境。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先行实施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的改革。浦东新区早在开发开放之初就设置了三条“高压线”,即任何领导干部不准擅自定低价和决定对个别项目的政策优惠、不准擅自决定工程发包、不准利用职权在征地和动拆迁中为亲属好友从中获利。这些制度的实施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所形成的公平竞争环境,有利于创新能力强的企业的引入和成长,对企业创新发展也是一种激励。

三是既要避免对改革开放试验的干扰,又要防范风险。这是深圳、浦东改革开放成功和向自主创新发展迈进的重要原因。深圳、浦东改革开放试验,尤其是最初的深圳,既有政治上的姓“社”姓“资”的干扰,也有市场的风险。在坚持国家主权下,坚持在限定的小区域内先行试验,这是具有“敢为天下先”的胆魄的前提。即便是正在进行的自贸区建设,也在监管上从一开始就实行“一线逐步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这样一种开放与监管并重的模式。这是风险控制的一种成功案例。此外,在深圳、浦东改革开放试验启动之初,由于以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为主,没有受到投机炒作的干扰,也就没有发生改革试验成本猛升而导致后续创新发展能力减弱的问题,进而有利于试验的本来价值的实现。雄安新区一开始就明确了不炒作房地产,并实行与就业挂钩的租房政策,正是借鉴了深圳、浦东改革开放试验的经验。

三、结语

建设雄安新区与建设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相比,有可借鉴之处在于有相同之处,即都属于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相对较弱之地建设新区,都是基于承接转移(深圳、浦东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雄安新区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并藉此实现创新发展。同时,也应当看到三者的不同之处,如在发展水平上,雄安新区建设启动之际,中国经济已不再是短缺经济,不再是单独的引入外资和技术,而是进入买方市场,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发展能力,在产能过剩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体制上,不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都是在把雄安新区打造成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和自主创新发展高地过程中,借鉴深圳、浦东经验时需要加以注意之处。

(下转 185 页)

台实施到在“二五”计划中退出的逻辑理路以及该战略对中国发展的长期影响。曲韵认为,由于我国在进口替代实施过程中没有遵循从对一般消费品工业进行初级进口替代到逐步对重化工业进行次级进口替代的“二步走”战略,导致资源配置失效,使得改革开放前不得不“断续性进口”而始终难以实现“替代”,并导致进口替代战略在我国的存续时间大大延长。马陵合认为,大跃进时期的土铁路热潮是以钢铁为中心、以“小土群”为形式的农村工业化产物。以土洋并举为目标的技术诉求,虽然得到政府和科研机构的支持,但却难以得到系统的政策保障和充足的资金介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大多数土铁路被淘汰,一些具有明显经济效益的线路则成为地方铁路网的基础。

本次年会采用了主题演讲、分组讨论、学术沙龙等多种组织形式,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积极展开讨论,气氛热烈,是一次难得的学术盛宴。

(责任编辑:王姣娜)

(上接第180页)

**From the Acceptance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 to the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Focus o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Shenzhen and Pudong Which Will Be Useful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Xiong' an New District**

Zheng Yougui

Abstract: The industry is moving from the low-end to the high-end, which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China to enhance its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fully share the development results and cross the “middle income trap”. It is the foundation and important symbol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Shenzhen and Pudong, as pilot areas for economic reform, have experienc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acceptance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domestic economic shortage to the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under the pressure of rapi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intense competition which is accompanied by the formation of the domestic buyer market. This, in fact, is the breakout for integration of high-tech monopoly.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has accumulated several experiences: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areas cannot stop at enterprises policy concessions and industry gathering, but should be committed to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to enhanc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capacity; it's important to absorb foreign investmen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adhering the basic socialist system, so that public ownership economy and variety ownership economy can innovate and develop together; respect for the law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global perspective to the industry's high-end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ayout, but also focus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inside and outside; both to form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rough economic and social talent, and also to form a social environment to ensure fair competition. These experiences can be used as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Xiong' an new district and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supply side.

Key Words: Shenzhen; Pudong New Area; Acceptance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dustrial Upgrading

(责任编辑:王姣娜)

• 185 •